

戴震文献学著作述评

余国庆

中文提要: 戴震是乾嘉时代考据学“皖派”朴学大师，一生著述宏富。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就戴氏在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天算学以及参修《四库全书》等方面的成就作出述评。高度评价他在传统经学、文字学、《水经注》整理等方面的卓越见解。

关键词: 戴震文献学徵学

戴震（1724～1777），清安徽休宁人，字慎修，一字东原，号杲溪。一生著述宏富，其著作有《尚书义考》二卷、《毛诗补传》二十六卷、《毛郑诗考正》四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中庸补注》一卷、《深衣解》一卷、《石经补字正非》四卷、《经考》五卷、《经考附录》七卷、《经雅》五卷、《方言疏证》十三卷、《续方言手稿》二卷、《声类表》十卷、《声韵考》四卷、《屈原赋注初稿》三卷、《屈原赋注》十二卷、《原象》一卷、《续天文略》一卷、《水地记初稿》五卷、《水地记》一卷、《水经考次》一卷、《句股割圆记》三卷、《策算》一卷、《九章算术订讹补图》九卷、《五经算术考证》一卷、《考工记图》二卷、《原善》三卷、《孟子私淑录》三卷、《绪言》三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东原文集》十二卷、《算学初稿四种》一册、《戴东原先生文》一册、《戴氏杂录》一册、《与段茂堂十一札》一册、《补遗》一册。他还参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此外，《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也出自戴震之手。

戴震对于传统经学、小学、哲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都有深刻研究，而尤专精于小学、数学、地理，是考据派中“皖派”重要人物。他精通古音，提出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首创阴阳入对转理论。他治经学，旁及名物训诂，从训诂入手探讨古书义理；他对于古代名物考释也有创获，在考据学方面卓然成一代大师。他治经宗汉学，重证据而不轻信，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晚年，他精研哲学，以考证、训诂阐发哲理，建立了戴氏哲学体系。下面就其一生文献学重要著作作约略的介绍。

一、经学部分

《经考》，五卷。是戴震早年读经时所写的札记，亦即经学考证，它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摘记经文及各家注疏，然后于卷中或卷末加“按语”，从“按语”可看出戴氏的思想观点，知识论方法，以书本知识为领域的实事求是研究法。第一卷为《易考》，第二卷为《尚书考》，第三卷为《诗经考》，第四卷为《礼经考》，含“三礼”、逸礼、大戴礼记等，第五卷为《春秋考》、《论语考》、《孟子考》、《尔雅考》等。全书共引用典籍七十余种，另有“按语”四十八条，这些均成为戴氏后来撰写专著的重要依据。书中反映了戴氏早年的学术路向，这时期他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徒，书中尊崇、肯定程朱观点之处所在多有。《经考》对新安理学家十分重视，从南宋朱熹、程大昌到元明时陈栌、胡炳文、赵汴、朱升以及清代江永等人的言论，作了较多札记，为我们研究戴震思想渊源及其发展提

供了重要资料。

《经考附录》七卷。亦为戴震早年读经时所写札记，“补《经考》所未备，而为之疏通证明”（《安徽丛书》编者许承尧语）。第一卷为《易考》，第二卷为《尚书考》，第三卷为《诗经考》，第四卷为《礼经考》，第五卷为《春秋考》，第六卷为《论语考》、《孝经考》、《孔子家语考》、《孟子考》、《尔雅考》等，第七卷为《石经考》。全书引用典籍一百多种，有“按语”二十五条，这些按语同样是研究戴震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

《经雅》七卷。是一部辨析草木鸟兽虫鱼名称而尚未完稿的专著，分“雅记”与“经雅”两部分。戴震取典籍中动植物名称，旁汇先秦诸子、汉魏古籍和经师的传笺注解，比照《尔雅》体例，辨析各物的古今雅俗名称，比较经传笺注与《尔雅》的异同。除《尔雅》外，戴氏大量引用《方言》、《说文》的说法。《尔雅》失其传者，则求之《说文》，或益之《广雅》；有时则据《尔雅》以证《说文》、《广雅》及《尔雅》郭注，体现了戴氏治学的精深与高明。本书搜罗完备，条贯分明，考辨旧说，多有发明，读一物而其古今雅俗之名、群经异同可见，是清代“雅学”史的奠基之作，后出之“雅学”专书，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所论，许多问题在《经雅》中都已谈到。黄侃《尔雅略说》评论说，清代小学家“专心训诂者多，推求名物者鲜。”可见《经雅》之作，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

戴震还撰有《尔雅文字考》十卷。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称，书稿藏孔继涵家，未刊。今仅存序文，书稿恐已亡佚。

《毛诗补传》二十六卷。是一部补正毛传、郑笺缺失，考释经文、传、笺中关键词语与名物的“诗经学”著作。作者在序文中说：“今就全诗考其名物字义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名物字义，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姑以夫子之断夫《三百》者，各推而论之，以附于篇题后。”

《毛郑诗考证》四卷。是戴震研究《诗经》的代表性著作。《毛诗补传》是本书成稿的基础。叶德辉认为《毛诗补传》是本书的原稿，抄本曾题作：《戴氏经考》。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八评曰：“是书于毛传、郑笺无所专主，多自以己见考证。或专摘经文考证之。大都俱本古训古义，惟求其是，而仍以辅翼传、笺为主，那若宋人说《诗》诸书，专以驳斥毛、郑而别名一家也。”揭示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不主一家，惟求其是，这种务实的学风，开乾嘉时代研究《诗经》的先河，启发了焦循《毛诗补疏》、胡承珙《毛诗后笺》、陈乔枏《毛诗郑笺改字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著作的面世。

《杲溪诗经补注》。是戴震未完成书稿，仅有“周南”、“召南”二卷，成于《毛郑诗考证》后十三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依次列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说解，另有足资参证的资料，则以夹注形式置于有关条目下，再以“按语”表明去取，或阐述己见。作诗之意，则附于篇题

后。“补注”以“补传”为基础，在文字考订、词语释义、典制辨证、篇旨探索，乃至行文修辞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补加工，其学术水准无疑高出《毛诗补传》。

《考工记图》二卷。《周礼》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汉时遗失，于是用《考工记》替补。学术界认为，《考工记》是春秋末齐国人所著的一部手工技术规范汇编。书中对各种器物的形状、结构、作用、制造原理与工艺等均予以阐述。戴震为《考工记》绘制了五十九幅有关器物的简图，注明器物尺寸，注文采自郑玄，或自己作了补注，对《考工记》本文及郑注多所是正，是研究《考工记》的杰出成果。戴氏认为，其图注可补原书的不足，可纠郑注的失误，可验遗器原物。有了这些图和注，使许多人们不了解的古代器物鲜明地呈现眼前。其中不少图已为后世出土文物所证实。这些图和注，不仅为阅读典籍提供说明，并且作为古代科技著作的详解，对后世产生影响。

礼学“十三记”，论文二十一篇。戴震有撰写《七经小记》的宏伟计划，它包括《训诂篇》、《原象篇》、《学礼篇》、《水地篇》、《原善篇》以及关于《论语》、《孟子》思想的阐述等七个方面，总体上说，是经学方法论的教科书。礼学“十三记”就是《学礼篇》的条目纲纪。这十三篇文章是《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褐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髻》、《记经带》、《记纁藉》、《记捍决极》。外加《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大戴礼记目录后语》、《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洫之法考》、《乐器考》等八篇论文，故总数共是二十一篇。礼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热门话题和难点所在，戴氏辨明堂，王国维后作之《明堂庙寝通考》，其结论与戴氏几乎一致，关于王宫三朝三门的考释，黄以周《礼书通故·宫室二》的考证结论，与戴氏亦相近。古代井田制度中川遂沟洫的排列，戴氏的解释订正了贾公彦对《诗经》“南东其亩”的说法。戴震的这些考证与诠释，拨开了礼学的千年尘封，还古代制度的本来面目，充分体现了他朴学的考证精神。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对礼服制度的考释，有许多观点都和戴氏一致。章炳麟也认为黄以周、孙诒让在这些方面，继承了戴震的学术观点。

《尚书义考》二卷。戴震原拟撰写《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但最后仅完成这一部分。在书中，戴氏对经文异同的考订，一丝不苟，于词语训释，广采汉人传注，对宋以后训释也有所甄择，再加按语以明去取。对于名物典制，天文历象的推究考证，往往博引旁证，究源竟流。其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著述中不存今文古文、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与同时代人相比，显出一代宗师的大度。戴氏为校注《水经注》而研读《尚书·禹贡》，校《五经算术》而对《虞书》和《夏书》中有关“璇玑玉衡”的研究，已成为史地学和天文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尚书今古文考》一篇。把非常复杂的《尚书》今古文史说得十分透彻，是“尚书学”的入门教材，也是对清初以来“尚书学”成果的总结。

《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书名是为儒家经书疏证，实际上是哲学范畴的论著。戴氏自称：“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之名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他借孟子“有物必有则”的命题阐明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出程朱学派“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实际就是道家的“真宰”和佛家的“真空”。

戴氏反对程朱学派把“天理”、“人欲”绝对对立起来，斥责理学家“以理杀人”。书中指出“欲者血气之自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无欲使“生生之道绝”，宋儒“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这种反理学的斗争精神和对人民的同情，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论说：“《疏证》一书，字字精粹”，“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

《原善》三卷。内容是经学的要义，天人之道的阐述。其阐述方法是援经说经，比类合义，加以综贯，从而发挥作者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在阐述戴氏自己的哲学思想，其目的在于消除程朱理学对经书的歪曲。

《中庸补注》一卷。是戴氏未竟之作，注《中庸》三十六条，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二。它与《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所阐发的思想完全一致。自然观方面，坚持了人与万物为“气化流行”所产生的唯物主义观点；认识论方面，否定了“先知先觉”、“天生圣人”等唯心主义先验论；人性论方面，认为“道不出人伦日用之常”，更把“以情絜情”视为天下国家存亡的根本，包含着对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人间不平现象的谴责，也包含着对未来自由、平等社会的呼唤，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石经补字正非》四卷。是戴震对唐开成石经系统校勘的汇录。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置石壁《九经》于太学。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成石经几经搬迁、修补，已渐失其旧。明嘉靖年间，关中地震，石碑倒损严重。万历年间，西安府学生员王尧典等人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于碑旁，以便摹补。顾炎武也曾对石经作过精心考订。戴氏“补字正非”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为开成石经补缺正非，就已所见残损部分补缺，就明人所补文字正非，并引据顾炎武的考订略作考辨。第二，专录谷梁石经上的改字。第三，将石经与明万历葛鼎所刊永怀堂本《左传》互校，录其讹谬之处。第四，是石经《孟子》讹字录，专录石经讹字，它不属于唐石经。“补字正非”体现了戴氏在校勘学上的见识与功力。

《屈原赋注》十二卷。这是，戴震从经部角度切入，在集部整理方面所撰。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关于屈赋二十五篇的诠释、义疏；二，关于屈赋山川地名及草木鸟兽虫鱼的通释；三，关于屈赋各篇字词的音义、异文等。在考据中抽绎理性认识，是本书一大特色，卢文弨序云：“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所创新说，多令人信服，是研读《楚辞》不可或缺的注本。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评曰：“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为不可多得云。”

二、文字音韵训诂部分

《方言疏证》十三卷。《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汉语方言学著作，也是世界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专著，自东汉以来，备见征引。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断烂讹脱，几不可读，被认为

虽存而实亡。戴氏以《永乐大典》本及古书中所引《方言》与流行的明本对勘，逐条援引诸书，一一疏通证明，改正错字 281，补脱字 27，删衍字 17，使之得以恢复本来面目。戴氏的疏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方言》条目逐渐形成民族共同语的轨迹，其思路是把共时记录转变成历时语言的研究，转变成历史语言学。其后，相继有《方言》校本问世，对戴疏亦有所补充订正，但从总体上看，功力都没能超过戴氏。戴氏的《方言疏证》，连同他的《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屈原赋注》等注释著作在内，奠定了清代朴学中的注释学基础。使我国古代注释学继《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水经》酈道元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之后，进入一个全面复兴和昌盛的时代。清代注释学的大发展，是由戴震创其业、发其端的。

《续方言》二卷。本书手稿是刘半农于 1928 年在北京发现的。戴氏的初衷在对《方言》有所补充。后来见杭世骏有《续方言》之作，因而中止。书中征引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何休《公羊传解诂》及杨倞《荀子》注以续《方言》之所未言。杭氏《续方言》所引文献资料虽极博赡，但戴氏此书亦可补杭氏书的遗漏。戴氏所采《荀子》、《释名》、《公羊传解诂》三部书，戴氏提及而杭氏书未采的，亦有二十二条，故其对杭氏书的补充作用是明显的。

《声类表》九卷。是戴震古音学著作，是以等韵离析《广韵》而构成的旨在上推古音的等韵图。书中分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每卷展示一类韵部。本书对古音学的贡献主要有：一，首创阴阳入三分理论，并以入声为阴阳通转的枢纽，此说对孔广森“阴阳对转”学说有直接影响；二，根据阳声韵与阴声韵相配的原则，从脂部分出祭部，与元部和月部相配，是古韵学一大发明；三，首创对古音音值的拟测。

《转语二十章》。今仅存序文，有学者认为，其正文就是如今传世的《声类表》。转语和因声求义，都是把汉语的古音系统应用到词义解释中去。戴震认为《尔雅》、《方言》、《释名》，可从历史语言学推释词义，但从意义入手而终止于意义，故他着力探索在古音系统内在结构中求语义，“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因此转语说是因声求义说的方法学基础。

《声韵考》四卷。收论文十六篇，其内容涵盖了等韵学、广韵学、古音学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创见的音韵学著作，诸多结论，为后世学者所遵用。

戴震在声类、古韵、转语三个最基本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他身后，启迪了洪榜、程瑶田、王念孙、阮元、郝懿行的研究，就是在近代，章炳麟、黄侃、王力也无不从他的学说中汲取智慧。

《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是对汉字“六书”阐释的权威性论文。戴震对“六书”提出“四体二用”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之体，而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定转注为互训，一扫前人纷纭聚讼，为其弟子及后世很多学者所认可和采用。转注互训说，发挥了词义解释的威力，

是清代语义学的重要理论建树。

三、天文地理数学部分

戴震不仅是乾嘉时代学界泰斗，在数学史、史地学、方志学、古天文学、近代天文学、近代数学的研究上，都有卓越的建树，可以说，在若干领域内，他是我国近现代科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

《句股割圆记》三卷。本书以中国传统的句股弧矢、割圆术为依据，推演三角学的基本公式，以求中西算学之会通。内容分两个大方面，一是有关句股弦关系的基本概念解释，二是句股应用割圆术。书中详细介绍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和历史，戴氏以特有的方式系统推演了平面三角形和球面三角形的句股原理，大大发展了自《周髀》以来的句股弦求法，通过他个人的努力，使传统句股弦达到了同时代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函数的水平，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是数学史上弘扬民族文化的盛事。戴氏并且把数学与经学结合起来，称言“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阮元在《畴人传·戴震传》评曰：“盖自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

《九章算术订讹补图》九卷。《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数学著作，约成书于西汉末，魏时刘徽、唐初李淳风曾为之作注，后来湮没散佚。戴震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本书。辑佚的《九章算术》讹误很多，而且原图全部失传，戴氏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并依注补图，撰成《九章算术订讹补图》，这对于《九章算术》的重新问世，并恢复其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具有开创之功。此后所出的各种《九章算术》版本，都大量采用了戴氏校订整理的成果。

《五经算术考证》一卷。《五经算术》为北周甄鸾所著，内容为对儒家经典著作及其注释中有关数学计算的地方加以解释。戴震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得本书，并撰写《考证》，对书中所引经史文字详加考订。戴氏一方面以传世经籍、史志校订了该辑佚本的一些讹文脱字，另一方面又据辑佚本所引古籍，酌情校正经籍、史志传本的个别讹误之处。在这两方面，戴氏都做了很好的工作。

《水地记》一卷。全书二十四条，记昆仑至太行之祖国大地。戴氏立意反传统地理学“于古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叙述方法，以中华历史文化为贯串而叙述中华大地的山川水流，以地理体现行政建制，经史子集无不俱引，以之作为历史证据，为解释地理服务，或以地理实情与文献中史实挂钩。这是他整理、研究《水经注》受到启示所产生的成果，也是他编写地方志实践经验的总结。以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考察郡县建制和地理沿革，是戴震的重要地理学见解。本书是清代史地学以水为主的奠基之作。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评论说：“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贴，至蹟而不乱。”“国朝之言地理者，于古为盛，而先生乃出其上”。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水经注》的整理。《水经》，旧题汉代桑钦撰，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地理专著。传世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酈注既保存了《水经》原文，又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注释。但在流传过程中，经文与注文相混，错乱颇多，由来已久。戴氏在整理时，总揽全局，发明条例，寻找内在规律，使经、注分开。他发明的条例有三条：一、经文中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另再举水名，注文中不得不屡为另行举之；二、经文叙次名水所经州县，仅说某县，注文常称“某故城”；三、经文云“过”，注文云“过”。这是戴震整理《水经注》的最大贡献，有了这三条，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酈注的机械，使经、注相混的酈注归于纯粹。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评论说：“得此三例，迎刃而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戴震自己也说：“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照然可举而正之。”“审其义例”，即据本书文例，属“本校”；“按之地望”，据实际道理，属“理校”，“以各本参差”，即据不同版本，属“对校”，在校勘学上带有普遍意义，为后代校勘学家所遵循。

参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珪任山西布政使，戴震是幕僚，故参与了方志的编写工作。汾州自明万历后即未修过府志，历代沿革不一，十分复杂，在撰修过程中，他辨明沿革，考证史实，驳正《元和志》的六大谬误，订正《水经注》、《读史方輿纪要》的不实之处，贯彻了乾嘉学派考释精审的主张与学风。

《原象》八篇。前四篇初名《释天》，分别以“璇玑玉衡”、“中星”、“土圭”、“五纪”为篇名，后四篇即《句股割圜记》。书中叙述了天文，历法的基本知识，目的是为阅读经籍服务。“璇玑玉衡”论日月运行轨道，明四季成岁，岁月更迭，日食月食的道理。“中星”论中星以明岁差。“土圭”论土圭测影之法，以明里差。“五纪”论日月星辰、历数之五纪，以明历法之宜随时测验。在文章中，戴氏用古天文理论以解决经史，借经史材料以讲天文，从而解决了古代天文著作中的疑难，又具体说明了古籍中涉及到的天文学问题。

《续天文略》七篇。此与《原象》是互相关联的姊妹篇。乾隆年间，朝廷开馆续郑樵《通志》，其中《天文略》部分由戴震补续，戴氏在序中指出，郑氏《天文略》“徒袭四史，未能择之精，语之详”。其写作目的在于“或补前书之阙遗，或赅所未及”。写作体例是：分类辑录古代典籍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论述，并用按语形式加以辨证评述，实际上是一部古代天文通志，也可说是一部古代天文资料的专题汇编。

四、《四库全书》馆校书部分

戴震一生科场坎坷，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其学识渊博，以举人身份破格被召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他为《全书》撰写的提要是：《仪礼识误》、《仪礼集释》、《仪礼释宫》、《大戴礼记》、《蒙斋中庸讲义》、《方言注》、《项氏家说》、《水经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

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等，其中，戴震据《仪礼集释》订补贾公彦《仪礼注疏》中的脱字二十四字，改讹字十四字，删衍字一百零六字，使《仪礼》成为可读之书。后来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图》，均是在戴氏《仪礼》定本的基础上完成的。戴氏从《永乐大典》内发现散见的《大戴礼记》十六篇，将其与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考核，并附按语。在提要里，戴氏从目录学史角度，叙述该书的流传经过，形成《大戴礼记》的书录史。孔广森的《大戴礼记》十三卷，就是在戴氏的基础上完成的。

戴震作为乾嘉时代汉学的一代宗师，他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在文献学上，戴震的见解也是非常深刻，极其卓越的。在学术路径上，他提出考据、训诂、义理三结合的方法，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他强调“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概括起来就是：以语言通经义，以语言通规律。即对字词的解释是手段，通道才是目的。这一方法学使戴震从纯粹的学问家向卓越的思想家转变。从语言入手也意味着抛弃宋明理学的架空立言。在思想方法上，则意味着以抽象统率具体，以有限驾驭无限，这义理是可以阐释的。在《六书音韵表序》中他指出：“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训诂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胡朴安在《古书校读法》中更将之概括为：“戴氏之治学方法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

在对待前人的思想学说上，戴震强调“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摒弃历史上汉学宋学之分，而求其“十分之见”。学术上，他批评宋学，也批评汉学，而唯求其是。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他指出：“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馀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源可以知流，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先儒之学，如汉郑氏（玄）、宋程子（颐）、张子（载）、朱子（熹），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

戴震还强调对一切学说，须独立思考，深入钻研，也就是要有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在《与某书》中，他说：“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时有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这种批判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使人们对真理性的认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作为乾嘉时代的学术领袖，他的这一主张对提高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学术真理性认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Discussion about Daizhen's Works of Document-Study

Yu Guoqing

Abstract: Among the textual research during the Qian and Jia period, Daizhen is a famous scholar of Pu-learning of School-Wan. He wrote rich and generous works throughout his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cument-stud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uccess that Daizhen achieved in the research fields of Confucian classic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 astronomical mathematics, taking part in revising "The Whole Books of Siku", etc. The author speaks highly of Daizhen's opinions in traditional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characters research, sorting out "The Notes and Commentaries about Shuijing" and so on.